论甲午战争时期帝党和言官的“倒李”斗争

董蔡时　　王建华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the Emperor's faction opposed the policy of suing for peace and struggled with the faction around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for political power. The high level officials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taction saw Li Hongzhang as their chief opponent and repeatedly launched movements to "oppose Li." The struggle to overthrow Li went through three phases after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Li and the Japanese in 1895. The main aim of the anti－Li faction was to resist the efforts of the Empress Dowager's faction to sue for peace by removing Li from his position of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installing pro－war officials to lead the war effort. Li's position was dependent on both the Empress Dowager's faction and the Huai Army－Beiyang group. So these groups were also targets in the fight to overthrow Li. In the end, the Emperor's faction did not succeed not only because Cixi's faction had already monopolized central government power, but also because the faction of the emperor and high officials itself had many weaknesses.

甲午战争时期,言官表现得相当活跃。众所周知,甲午前后帝后党争相当激烈。关于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说法,史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综观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这个结论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言官们虽然并不都是帝党成员,大部分却是属于主战派,在此期间就一些有关和、战的关键问题,每当帝党官员攘臂呼之,必有一批言官追随于后,与之呼应。李鸿章是当时中日交涉的具体执行人,战争前期战场上的清军统帅,但他始终主张妥协求和,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又是阿附后党、手握重兵的地方重臣。鉴于李鸿章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帝党无论是从贯彻主战方针,还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出发,都始终将他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多次发起“倒李”活动,言官则成为“倒李”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

帝党和言官联合进行的“倒李”斗争,迄于 1895 年 2 月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94年7月到8月间，即战前和战争初期。当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极力主张依靠列强调停，对日妥协，以求避免战争，引起帝党的强烈不满。为此，他们开始策划将李鸿章调离北洋，削弱其权力。帝党成员、翰林院修撰张謇向翁同和建议，将李调往威海，用湘系人物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势而约制之"①。为此，7月间，帝党骨干内阁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先后上奏，严厉批评李鸿章。文折称：中日交涉已达数月，北洋调兵"趑趄不前"，"坐失时机"②；志折措词更为尖锐，抨击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③。言官积极予以配合，给事中褚成博，御史张仲炘皆指责李鸿章于战事准备迁延观望，一味依赖俄、英调停，实为"开门揖盗"，"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④。给事中余联沅则对李鸿章"当锁钥重寄"，"能否确有把握"，表示怀疑。⑤当然，李鸿章树大根深，区区几个奏折是难以将其撼动的。

7月25日，中日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李鸿章仍坚持消极作战，积极求和的方针，帝党和言官们的"易李"心情也更为迫切。8月23日，志锐奏："近闻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侵满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且"语言时有舛误"，举止更多荒唐，以此人主持战事，"大局尚可问哉"？他建议"简派重臣至津视师"，如李病情属实，即留天津坐镇，调度一切⑥。8月26日，余联沅奏，李鸿章在六个方面贻误大局，不可再专任李氏，而应"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⑦。此外，御史安维峻、钟德祥、张仲炘等也异口同声请于李鸿章之外，另择忠勇知兵的宿旧重臣主持大局，指挥战事。然而，这些建议在后党孙毓汶，徐用仪等把持的军机处全都碰了壁。如对志锐折，军机处驳斥道："查李鸿章数月以来，并未因病请假，调度一切见于电奏，亦尚周币，军事饷事仍应责成李鸿章一人经理，至津视师应无庸议"。⑧对余联沅一折，则称："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⑨帝党的"倒李"计划初度受挫。

第二阶段为1894年9月至年底。9月中旬，爆发了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在水陆两个战场均告败北。帝党和言官们乘机将倒李活动推向高潮。9月17日平壤败报传到北京，在李鸿藻和翁同和的坚持下，光绪帝顶住后党的反对，对李鸿章施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李鸿章极为不满，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宣称自己对东北战场相距过远，"未便遥制，应请特简重臣督办，以便调遣而专责成"⑩。帝党和言官抓住时机，顺水推舟，以求由主战大员取李而代之。文廷式奏：李鸿章"贻误军事，罪无可辞"，"此时若仍恃该大臣一人调度，必至忿恚弃师，不可收拾"⑪。给事中洪良品奏，李鸿章"志存和局"，"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为此，朝廷应"再简一知兵大员为统帅，以免遥制而一事权"⑫。他们的建议仍为后党拒绝，慈禧太后亲下懿旨，对李鸿章慰劳有加，称其"布置有素"，军事上仍"责无旁贷"⑬。翁同和对此甚为沮丧，说："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此天也！"⑭

然而，帝党并不愿就此罢手。仅仅在慈禧的懿旨下达两天之后，9月22日，志锐即再上一折，严厉批评李鸿章在军事部署上有四大错误，请撤去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职，"责令统帅淮军，专筹攻战"⑮。显然，志锐之意在使李鸿章仅成为一方战将，不再拥有统筹全局之权。此时，慈禧太后已决心推行议和方针，以免影响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9月底，在帝党的一再建议下，恭亲王奕䜣被重新起用，主持总理衙门，然而奕䜣却大负帝党所望，在和、战问题上，完全禀承慈禧的意旨，一心主和。10月初，他出面请求英国联络列强共同调停中日战争。帝党深感局

势危急，要扭转局面，唯有在战场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欲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又非倒李不可，于是也加快了倒李的步伐。10 月上旬，参李之折连篇累牍，形成极大的声势。

10 月 5 日，帝党官员翰林院编修丁立钧、黄绍箕及其他翰林院官员 35 人联名上奏，弹劾李鸿章“广蓄私人”，“欺罔朝廷”，“断难再事姑容，坐视大局糜烂”，“请量简知兵大员，老成宿望，星驰往代，速筹守备”。此折语气沉痛，有“天下士民公论谓：李鸿章如不以严谴去津，则天下之精兵猛将必不能得其死力，以挽回既溃之局。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大有关系”之语⑯。同日，张謇也单上一折，称李鸿章“违抗朝旨，排抵言官，匿军报之实情，截京官之私讯”，可“比以宋之秦桧、贾似道，明之严嵩，赵文华”。张折抓住慈禧太后想依靠李鸿章主持和局的心理，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几个方面，分析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论和战，“北洋大臣实非天下唾骂之李鸿章所能胜任”，应“另简重臣以战定和”⑰。此二折，言战言和，有理有据，相当有说服力，可是后党一意孤行，“皆不报”⑱。8 日，御史陈其璋，给事中余联沅、洪良品又各上一折，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主要从李鸿章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上做文章，以消灭其权力为目标。称其“年志昏庸，志衰意乱”⑲，“人已暮气”。“心不欲战”⑳。陈其璋建议“简派重臣会同李鸿章督办北洋军务”㉑；余联沅则说李氏畛域之见太深，调往直隶一带的湘营应“另简统帅”㉒。折上，军机处仍不予理睬。

10 月下旬以后，日军分南北两路侵入我国东北境内。淮军各部除聂士成尚能进行有效抵抗外，大多或溃或逃丧城失地。后党和李鸿章求和之情更迫。11 月中旬，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派德籍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代表中国求和，帝党和言官们再度奋起抗争。11 月御史安维峻上折严参李鸿章之子李经方；12 月御史张仲炘奏劾北洋集团中人物盛宣怀，胡燏棻，皆兼劾李鸿章，且措词异常严厉。如张折称：李鸿章“傲慢不恭，刚愎自用，怠忽兵事，贻误国家”，“此次军务之坏，罪由李鸿章，天下之人无不唾骂”㉓。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言官们开始更明显地将打击后党与倒李结合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论述。慈禧太后和后党虽然接连采取行动，打击帝党，但由于淮军连连溃败，湘系将领被大量起用，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不得不在旅顺失守之后，给予李鸿章以“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的处分㉔。随后，又于 12 月 28 日任命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削弱了李鸿章的权力。帝党和言官的倒李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三阶段为 1895 年 1 月到 2 月。在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的同时，慈禧太后和奕䜣也决定派户部侍部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求和。主战派迫切希望刘坤一主持军事后，战场上能有较大的起色，以抵制主和派的求和活动。他们担心李鸿章仍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继续控制淮军和北洋水师，遇事掣肘，对战事不利。为此，这一时期帝党和言官们的舆论重点，是要求李鸿章真正交出军事指挥权，特别是北洋水师的指挥权，让刘坤一统一指挥水陆各军和后勤业务。此类折片甚多，如 1 月 12 日御史高燮曾请饬刘坤一恪遵谕旨，“一以事权”。并附片请由山东巡抚李秉衡就近节制海军各战舰㉕。左庶子戴鸿慈奏，直隶总督、奉天将军等均有节制军队之权，钦差大臣又无粮饷之权，节制军队势必空有其名，请“令李鸿章专管直隶总督，以刘坤一兼署北洋大臣?，“一切调兵转饷尤易指挥”㉖。次日，张仲炘奏，刘坤一既任钦差大臣，“号令不可不一，事权不可不专”，除陆军外，全国所有水师也应归其统辖，各军粮饷军火应归其综理㉗。还有人主张将李鸿章调离北洋，如 1 月 18 日侍读学士准良建议以参赞机密为借口，令李鸿章来京，另派“简明有为大臣署理”北洋大臣㉘。2 月 6 日，御史谢隽杭“请旨召李鸿章入阁，为伴食宰相，勿使坐据要津，阻挠大计”㉙。从翁同和日记来看，这些奏折皆未引起重视。光绪

帝虽然于1月18日任命云贵总督王文韶为北洋邦办大臣，但王为人圆滑，对李鸿章奉命唯谨，达不到分割李鸿章权力的目的。刘坤一出任钦差大臣后，军事上也并无多大起色，东北战场反攻海城之役，迄无捷音；山东战场威海卫，于1月中旬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2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此后，帝党和言官们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议和条款和请求拒签《马关条约》的斗争，李鸿章更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国人皆曰可杀"。这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兹不赘述。

二

李鸿章的地位主要靠两股势力支撑着，一是中央的后党集团，他们是李鸿章政治上的靠山和奥援；二是淮系——北洋集团，他们控制着当时号称中国最精锐的陆军——淮军和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军事支柱。因此，帝党和言官们在进行倒李活动时，除了直接参劾李鸿章外，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后党集团和淮系——北洋集团。

帝后党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本文不拟全面论述，所涉及者仅为与倒李活动有关的部分，这也是帝后党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内而罢斥后党骨干（孙毓汶、徐用仪等），外而扳倒李鸿章，是帝党的主要计划。后党方面则拼命反击，压制、打击谏垣诸臣，慈禧更是屡施淫威，双方斗争十分激烈。

为打破后党把持朝政的局面，光绪帝于7月15日命翁同和与主战的大学士李鸿藻参加军机处会议，然而，孙毓汶、徐用仪依靠慈禧太后的支持，仍遇事把持，双方在和战问题上时起冲突。8月16日，志锐疏劾孙毓汶"专愎性成，任意把持，不顾后患……皇上欲用言路，该大臣则阴抑遏之；欲倚重老成，则坚摈远之；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而徐用仪则性情柔猾，事事仰承孙毓汶之意，"即会议一事，徐用仪毅然秉笔，翁同和等不过略易虚字，乃封折之际，会议者竟不得与闻"。是折还首先触及到孙毓汶等与李鸿章狼狈为奸的关系："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为此，请"立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㉚。志锐此折，不啻一重磅炸弹，击中了孙、徐的要害。次日"办奏片"，二人皆负气不肯动笔。在慈禧的干预下，光绪帝不得不对二人"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但同时也"戒饬改过"㉛。

孙、徐等既有慈禧为之撑腰，并无"改过"之意。此后，当帝党、言官连疏请罢斥李鸿章时，他们或公然予以驳斥，或干脆置之不理，已见前述。9月20日，志锐再度奏劾"办事大臣结党欺蒙种种罪状"，"丁汝昌之株守威海，不为前敌接济；李鸿章坐失时机，不办后路，断无以其罪者，挟洋人以自重，诸事有意迟延，只候前敌一败，则藉此以塞主战者之口，迫朝廷以言和，此办事诸君之本心也"㉜。10月18日，文廷式奏"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应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㉝。此二折皆无反应。11月以后，言官们群起上陈，不仅言词更为激烈，且进一步将矛头指向慈禧太后，帝后党争空前激化。

11月3日，光绪帝令翁同和、李鸿藻再入军机；16日，将依附于孙毓汶的额勒和布和张之万逐出军机，以图改变军机处的力量对比。19日，御史王鹏远乘机上奏，指出孙毓汶、徐用仪"罪更浮于额勒和布、张之万也"，请皇上"外出跋扈自专之李鸿章，内罢庇奸罔之孙毓汶，徐用仪"㉞。20日，安维峻严劾李鸿章父子，并称："人第谓其勾结枢臣，交通太监李莲英，互为倚庇，虽皇上亦无如该督何"㉟，表露了对慈禧太后把持朝政的不满。27日，文廷式亦再度弹劾孙

毓汶。慈禧太后公开出面为孙毓汶撑腰，说文廷式一折“语涉狂诞，事定当将此事整顿”㊱，向帝党发出威胁。慈禧此举不仅未达到压制言路的目的，反而引起言官的极大反感。30日，以敢言著称的御史高燮曾冒死上奏，指斥慈禧的懿旨，“谓枢臣不应唯阿取容，无所匡救，并有‘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云云”。慈禧阅奏后，满面怒容召见枢臣，称高折“以为离间，必加辨驳”。翁同和和部分枢臣为高缓颊，再三劝解，慈禧方表示：“姑从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孙毓汶却乘机攻击言官“结党陷害，风习已然，请鉴悉”。㊲

慈禧太后屡施淫威，无非是为了压制主战舆论，扫除对日求和的障碍。孙毓汶、李鸿章之流从此更加有恃无恐。12月下旬，张荫桓、邵友濂受命赴日求和。有“铁汉御史”之称的安维峻忍无可忍，于12月28日毅然上《请诛李鸿章疏》，对李鸿章，慈禧太后和主和枢臣皆痛加指斥。疏云：“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军火，则有意勒措之。有言战者动辄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不但误国，而且卖国。……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㊳此疏于李鸿章之罪，除力主和议外，类多意气之词，并无实据，但点出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及后党枢臣互相勾结的关系，则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至于公开痛斥慈禧太后，更属石破天惊之举。事后，安维峻被革职，谪戍张家口，然此折却引起极大震动。安氏本人也“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㊴

安维峻一折，使帝后党争达到高潮，安氏获谴，也说明帝党和言官们仅凭舆论的力量，无法动摇慈禧太后的地位，自然也无力达到罢孙、倒李的目的。此后，部分言官虽然并未就此罢手，如2月15日，就有给事中，御史共9人联衔上奏，指斥枢臣“既不肯虚怀采纳群言，又不能和衷以共济国”，“李鸿章误之于外，而该大臣等误之于内”，以致“祸逼畿疆，朝野震动”㊵。但这已是强弩之末，无法改变李鸿章受命赴日求和的既成事实。

在打击淮系——北洋集团方面，帝党和言官们也是不遗余力的。从《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中日甲午战争档案》来看，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在弹劾之列。淮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张冀、严复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袁世凯、马建忠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张佩纶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㊶。这些弹章，固然是言官们出于对淮军和北洋水师作战不力的气愤，以及处罚逃将，鼓舞士气的需要，同时也包含着打击李鸿章的因素，这是一种批其枝叶以动摇根本的策略。因此，在参劾淮将的同时，他们又交章荐举董福祥、余虎恩、陈湜、魏光焘、程文炳等非淮系将领，以图由他们取淮将而代之，架空李鸿章。

关于帝党和言官打击淮系——北洋集团的斗争，限于篇幅，仅举其参劾丁汝昌之事以证之。

在被参劾的北洋诸将中，被参最早的是丁汝昌，最多的也是丁汝昌。早在战争爆发前，志锐就奏参叶志超、丁汝昌“皆首鼠两端，意存观望，纵敌玩寇”，“外间舆论至有败叶残丁之诮”㊷。战争爆发以后，丁汝昌更是屡挂弹章，几成众矢之的。其中又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894年8月间，

另一次是1894年底至1895年初。

1894年8月，志锐、余联沅、文廷式、安维峻、易俊、高燮曾等纷纷上奏，或单参，或于别折中附参丁汝昌，其中志锐、安维峻、易俊皆连上两折片。这些奏折几乎异口同声请对丁汝昌予以严惩，或"革职拿问治罪"，或"审明正法"。综观他们所列丁汝昌之罪行，皆大同小异，可以志锐两片概括之。其8月3日一片称："闻其带队出洋，以未遇敌舟而无队按仗，退守威海，借口固防，并欲告病求退。"⑬其8月16日一片称："倭人攻威海卫已四、五日，未闻战舰折回堵截击之。倭人未时，丁汝昌先一日放洋，无不相遇之理，知其来而先避之，与之遇而不击之，谓之无消息，非畏敌，将谁欺乎？"⑭一言以蔽之，畏敌如虎，消极避战。

大东沟海战之后，帝党和言官对丁汝昌的谴责有所缓和。11月下旬旅顺失守以后，再度升温，到威海卫保卫战时形成第二次高潮。如1月20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颐奏李鸿章袒庇丧师失地，"败坏海军之丁汝昌"，请"特简忠勇知兵大臣，统领海军"⑮。2月3日，给事中余联沅奏："丁汝昌恇怯无能，蛰伏威海，此次兵事之坏，总由海军不能御敌，以致倭寇猖獗，夺我天险，入我内地，其罪实浮于卫汝贵诸人。乃为李鸿章所袒庇，至今未能正法，人心莫不痛愤。若不将丁汝昌立行褫除，则海军亦断无起色。"⑯此外，尚有2月8日，给事中褚成博奏"丁汝昌失陷要地请立加诛殛以伸国法"⑰；2月9日，左庶子戴鸿慈奏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不发一炮"，且"驾定海舰潜逃"⑱等等。

凭心而论，丁汝昌虽有可参之处，但他决不是罪魁祸首。即以8月份的参丁高潮而论，且不说他完全受制于李鸿章，并无北洋水师进退的决定权，即使志锐等人所举罪名成立，也罪不至死，何以竟会人人皆曰可杀？到后期，他坐守威海卫，也完全是奉李鸿章之命，况且他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抵抗的。言官们不仅将他与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龚照屿等人同列，而且参丁之折远远超过上述诸人，这又是为何？其实，帝党和言官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参丁是表面现象，倒李才是真正目的。

战争初期，叶志超谎报牙山战功，讳败为胜，帝党在不摸底细的情况下，只有暂时放下淮军陆将，集中火力攻击丁汝昌。在战争后期，淮军各部在陆战中连战皆北，到旅顺口失守以后，更面临上崩瓦解之局。宋庆、依克唐阿、吴大徵、陈湜、魏光焘、李光久等非淮系部队已成为东北战场的主力，淮军对支撑李鸿章的地位已不起多大作用，唯独北洋水师还是一支只听命于李鸿章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们再度把打击矛头指向丁汝昌。上述诸折，除了列举丁汝昌的"罪行"外，几乎都同时包含着两个内容，即李鸿章袒庇丁汝昌和要求另外简派北洋水师指挥官。这充分说明，帝党和言官的真正目的有二：其一，通过参劾丁汝昌，追究李鸿章的包庇袒护之罪；其二，更易北洋水师的指挥权，撤掉这根支撑李鸿章地位的军事支柱。

三

由于慈禧太后和后党集团始终牢牢控制着朝廷实权，支持李鸿章，而帝党和言官们则"多是一些不掌实权的词馆清显、台谏要角"⑲，在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故而，他们的倒李斗争最终未能达到目的，也未能阻止李鸿章和后党的妥协求和活动。甲午战争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然而，帝党和言官们的倒李斗争的意义，仍不容低估。

其一，通过倒李斗争和批判后党的妥协活动，宣传了主战派的主张，形成了强大的反侵略舆论，促使清政府调兵遣将，对日宣战，并在战场上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华民

族不甘屈服的爱国精神。

其二，在政治上打击了李鸿章和后党集团。虽然倒李计划未能实现，后党也始终控制着中枢权力，但帝党和言官们通过对李鸿章和后党集团的严厉批判，揭露了他们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对外妥协求和的嘴脸，使其声名狼藉。战后，李鸿章再未能复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和地位；孙毓汶、徐用仪两个军机处中的后党骨干也于 1895 年 8 月被先后逐出军机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

其三，在帝党和言官的要求下，大批淮系将领因作战不力或临阵脱逃受到惩处，宏扬了正气，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斗志。战争后期，类似叶志超之流遇敌辄逃的现象明显减少。

然而，我们也应指出，帝党和言官们的倒李活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他们坚决主张抵抗侵略，值得肯定，但他们的主战行动，往往不是建立在敌我双方综合国力的科学分析之上，而是认为日本“国小民穷”不堪一击，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虚骄之气甚浓。他们对李鸿章在总体战略和具体指挥上给予了许多批评，有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但更多的人却提不出正确的军事主张，多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如他们反复提出组织沿海船民配合水师直捣日本列岛，就显然脱离实际，这往往成为李鸿章和后党予以反驳和讥评的把柄。其次，他们在弹劾李鸿章和淮系将领时，为增加说服力，往往罗列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喜作荒诞夸大之词。诸如李鸿章每日上电气一百二十分，用铜绿侵灌血管；认倭女为义女，李经方娶日女为妾；李鸿章在日本有洋行、茶山、资本达数百万；李鸿章接济日军粮米弹药，纵放日本间谍；丁汝昌驾舰潜逃等皆属此类。唯其荒诞和捕风捉影，故虽耸人听闻，反而没有说服力，成为后党反驳或不予理睬的借口。复次，他们在弹劾前线将领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作调查研究，滥施攻击，打击面过宽；使前线将领有动辄得咎之感。前文已指出，他们对丁汝昌的参劾，就有欠公允，增加了丁氏的心理负担，意志消沉。正如他在威海卫保卫战期间的一封信中所说：“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遑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㊿这对战争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①《张謇致翁同和密信》。

②③④⑤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 605、623、582 和 603、628－329、124－125、624 页。

⑥⑮⑯⑰⑳㉑㉒㉓㉔㉜㉞㉟㊱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124－125、249－250、304、312、326、331、327、328、603、234、569－570、576、44 页。

⑫⑬㉙㉚㉝㊵㊶㊹㊺㊻㊼㊽丛刊：《中日战争》三，第 61－63、63、109、114、37－38、168－169、421－422、549、39、327－328、370、398、403 页。

⑧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7，卷 20。

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78。

⑭⑱㉛㊱㊲丛刊：《中日战争》四，第 574、499、489、517、518 页。

㉓㉕㉖㉗㉘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二，第 22、140－141、143、152－153、188、388、22 页。

㊳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三，第 124 页。

㊴《清史稿》卷 445。

㊸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第 320 页。

㊿《丁汝昌致戴宗骞书》，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 355－356 页。